

闽南“送王船”在海外传播机制和非遗传承的相关研究

邹 杰（泉州师范学院陈守仁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背景下，以闽南地区“送王船”为代表的承载海洋文明基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海外传播的过程成为观察中华文化与世界沟通的重要窗口。本文以文化传播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搭建框架，综合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分析方法，系统梳理“送王船”在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传播渠道，阐释其从民间祭祀仪式发展成跨文化交流符号的逻辑依据。“送王船”依托移民携带、侨团推动、文旅融合等方式在海外落地生根，既保留“代天巡狩”“消灾纳福”等核心信仰内涵，还吸纳当地文化特色，实现了本土化表达，成为巩固华人文化认同、助力多元文化相互沟通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为闽南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案例资料，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发掘出新的路径。

关键词：闽南文化；送王船；非物质相关的文化遗产

一、“送王船”作为海洋文明符号所具有的研究价值

（一）“送王船”的文化基因与核心内涵

“送王船”是闽南地区千年以来流传的民间信仰仪式，主要分布在厦门、漳州、泉州以及台湾地区，2020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的代表作名录，这一仪式起源可追溯到远古“雩祭”传统。姜守诚（2011）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明代杨嗣昌所著的《武陵竞渡略》之后，体现出“送王船”原型能追溯到古老的“龙舟竞渡”传统，同时强调其原始的样子与驱逐瘟疫的目的联系十分紧密^[1]。随着时间的流逝，该习俗融合了道教、民间信仰以及特有的海洋文化元素，它的核心流程涵盖“造王船”“请王”“祭王”“送王”等一系列郑重的活动，人们用这些仪式，祈求“代天巡狩”的王爷神把疫病消除，保障一方太平。

在“送王船”仪式开展的过程中，王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是承载神灵的神圣载体，更是意味着“灾厄”的容器。闽南地区的人群长

期接触海洋，面对千变万化的海洋环境和难以预料的灾害，送王船仪式成为他们不可少的精神寄托方式。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平安的祈福都融入该仪式当中，体现出闽南人所具有的“敬畏自然、感恩包容”生存智慧，这也是闽南海洋文明独特体现的方面。

（二）研究“送王船”海外传播的意义

东南亚地区为闽南人主要的侨居，当前，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闽南籍华人有 1500 多万。从明清时起，随着移民潮的兴起壮大，“送王船”这一民间信仰仪式也一同被带到了东南亚。在国外不同文化语境中，“送王船”有了不少适应性的演进，逐渐成为华人社区巩固文化认同的重要联系。

当下学界围绕“送王船”开展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国内“送王船”的仪式形态方面，结合地域民俗特征深入剖析，如对国内不同地区仪式流程的不同之处、仪式背后宗教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送王船”在海外传播的系统性研究是比较匮乏的。本文以东南亚为主要考察范围，

着重钻研“送王船”于跨文化状况中如何实现传统的延续和创新发展，目的是给闽南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微观维度的实证研究，填补这一研究方面的部分空白。

二、东南亚“送王船”传播的路径和历史分期

（一）萌芽期（16—19 世纪）：移民带来与初步扎根立足

在明清时期，国内人口膨胀与土地资源不足，推动众多闽南人选择“下南洋”谋生计，远赴异国他乡扎根求生，因而开启了一段有挑战与盼头的移民历史。在这个进程中，他们把家乡的文化与信仰带到了东南亚，其中“送王船”信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张昊（2022）通过文献研究，指出“送王船”习俗是 16 世纪前叶在闽南地区起源的，凭借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在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多国流行起来，它的传播路径受不同历史背景的影响^[2]。石奕龙（2023）把富美宫传统“送王船”仪式和厦门等地的仪式进行比较，说明了仪式在不同地区传播时的变化^[3]。按照《菲律宾华人移民史》所记载，早在 1571 年，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马尼拉华人社区中呈现出小型“送王船”仪式，参与仪式的以福建籍渔民为主，他们于远离家乡的地方，面临各种困难，海洋捕捞有着很高的风险，疫病对他们的生命安全造成频繁威胁。在这种生存压力情况下，“送王船”仪式成为他们心灵的寄托和求康泰的重要办法，虽然条件不太好，仪式的器具大多就地取材。王船规模同样是相对较小的，但这没有减少他们对信仰的虔诚。在马来西亚所处的地方，马六甲“三宝山”遗址周边出土了清代王船的一些残件，经专家鉴定评定，这些残件具有漳州地区的风格形态。此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送王船”信仰已随着商船贸易传入马来半岛，商船在开展贸易交流的同时，不仅促进了经济的交换，也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送王船”信仰在马来半岛扎根发展后，逐渐于当地华

人社群中传播开来。

（二）发展期（20 世纪初—21 世纪初）：侨团促进的制度形成

20 世纪初期，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社团在“送王船”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助力其拓展的重要力量。1910 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操办了首次大规模“送王船”仪式，这次仪式邀请了国内富有经验的道士来主持，让数千华人参与到活动里，现场十分热闹。在此次开展的仪式中，新加坡福建会馆确定下“每三年一科”的祭祀周期，这一做法使“送王船”仪式更符合规范且形成制度体系。每到祭祀周期，“送王船”仪式都成为新加坡华人社区的一项重要活动，拉动众多华人主动参与。1925 年，于菲律宾宿务，“通淮庙”被建起，“送王船”被编进年度庆典内容。主要的宗教是天主教，“送王船”仪式跟当地天主教节日在时间上形成了间隔，成为华人社区特有的文化标识，加大了华人社区的文化分界。随着仪式流程逐渐规范化，侨校、华文媒体也开始留意，对“送王船”文化意义加以宣传。侨校利用开设相关课程，向年轻一代教授“送王船”的历史源头、仪式程序等知识；华文媒体以报纸、刊物等形式，对“送王船”仪式做新闻报道，使其影响力不断增大，从民间习俗慢慢上升到族群认同的重要标识。

（三）转型期（2010 年至今）：文旅融合和全球化表达相融合

从 2010 年起往后，2006 年“送王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 2020 年更是被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海外的传播进入一种全新的情形，在全球化态势和文化产业飞速崛起的大背景下，“送王船”跟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促使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现代转型和在全球传播。施晓楠（2023）于研究中详细探讨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同申报“送王船”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指出这种跨境民族的文

化在历史变迁中虽各有过人之处却同根同源，并着重指出“送王船”将中国和马来西亚联系起来，而海洋使整个世界连接起来^[4]。

马来西亚槟城将“送王船”纳入“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推广项目中，大力挖掘“送王船”的文化价值，开发了一系列文旅相关产品，如“王船制作体验”活动，使游客亲身体验王船制作的过程，感受其中文化带来的魅力；“海上送王”活动让传统仪式盛大的场景再次出现，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前来参与。

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多次邀请“送王船”团队进行展演，在展演开展的过程中，巧妙融合多元创意，利用灯光艺术、现代舞蹈等现代艺术形式重构仪式场景，将传统“送王船”仪式跟现代艺术有效结合，使古老仪式拥有了新的生命力，使它更对应当代人的审美追求。2019年，菲律宾华人同当地摩洛族合作搞了“跨文化送王船”活动。王船装饰纳入了摩洛族图腾，这一创新办法呈现了多元文化共生的新趋势，也给“送王船”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活力，让“送王船”成为促进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

三、海外“送王船”的文化适应过程跟在地化特质

（一）仪式要素的选择性保留与创新

在东南亚相关地区，“送王船”还完整传承传统礼制，保留了核心仪轨，如“点眼开光”“绕境巡安”“焚船送王”等项目，但在具体形式上发生了很多改变。

1. 空间载体。以新加坡、吉隆坡为例，由于城市可用空间有限，传统“海上送王”的方式难以开展。当地把仪式举办场地变更为空旷的停车场或公园，以“陆地焚船”的办法开展仪式，人们会把王船骨灰撒到大海里，用这样的做法保留了“送王归海”的象征意义，还适应了城市环境状况，进而继承了文化的核心内涵。

2. 参与主体。在传统“送王船”仪式中，道

士起到主导作用，出现了“华人宗长跟本土祭司”协同主持的模式。孙静和陈晓风（2025）基于象征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思索了“送王船”仪式在中国沿海居民多元复合海洋宇宙观中的地位相关问题，表明了仪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象征价值。以马来西亚怡保相关仪式为例，马来巫师参与祈福环节中，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人员共同参与主持仪式的方式，不仅体现出不同文化彼此的信任与尊重，也使仪式增添了新内容^[5]。

3. 物质符号。王船的材质也有所改变，由传统的杉木改成铝合金框架蒙以纸质彩绘，这种改变既考虑了材料的耐用性和方便性，又降低了制作的费用。在装饰图案方面，融入了东南亚特色的花卉，如扶桑花、蝴蝶兰等，使王船具有地域特色，船身题字同时采用汉字与罗马字母，既保留了文化的本真性，也顾及了当地不同人群的阅读可读性情况，使更多人有机会了解“送王船”文化。

（二）功能转化：从祭祀法式到文化联系

在海外华人所处的社会，“送王船”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祭祀祈福，而是拓展至多元文化功能。

1. 内部的凝聚。田禾（2022）从文化价值这个角度切入，强调了送王船仪式内部凝聚力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6]。菲律宾华人族群以共同参与“送王船”仪式的方式，强化了“祖籍”的相关记忆。年轻一代以担任“王船乩童”“仪式义工”等角色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仪式中，建立起和闽南文化的情感关联。在此过程中，“送王船”仪式成为凝聚华人族群的主要力量，加大了华人彼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 对外交流方面。在新加坡，“送王船”被纳入国家多元文化展示体系，成为政府所认可的“华人文化代表性符号”。2023年国庆举办庆典时，牛车水街区有王船模型巡游，向世人表露了“新加坡华人文化遗产”，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沟通和

展示的主要窗口,以促进不同族群相互认识与文化交流。

3. 经济助力之下。马来西亚巴生港形成“送王船”产业集群,涵盖从木材加工、雕刻彩绘到文旅策划等完善的产业体系。这一产业集合体的发展,不仅传承和弘扬了“送王船”文化,还促进当地就业人数的增加,产生了相当不错的经济效益,每年所产生的产值超 500 万令吉,达成了文化与经济的共同推进。

(三) 精神内核的跨文化共鸣

“送王船”仪式所包含的“天人合一”“惩恶扬善”等理念,根据林继富和马培红 2022 年的研究,说明其于不同地域传承的逻辑,还突出了它“和”的文化核心,这一仪式同东南亚本土文化在价值上产生了共鸣^[7]。

在印尼棉兰,华人社区将“王爷信仰”同当地“拿督公”信仰相融合,他们坚信王爷神与拿督公都有守护地方的力量,都被认定为“地方守护神”,这种信仰的整合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基于共同守护社区平安的信念结合,进而推动了文化的交流融合进程。

在泰国普吉开展的“送王船”相关仪式中,融入了泰式佛教诵经的内容,产生了“道教仪式+佛教仪轨”的复合结构,这种宗教方面的融合使“送王船”仪式内涵更为丰富,还为不同宗教达成和谐共处提供了示例,体现出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美好场景。

四、“送王船”的传承挑战与创新对策

(一) 传承困境分析

1. 代际断层。在东南亚,年轻华人大多使用英语或当地语言交流,在理解闽南语仪式唱词上有困难。2022 年一项相关的调查显示,在菲律宾 18—30 岁的华人群体内,仅 23% 的人能把“送王船”核心传说完整讲出来,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一代对于“送王船”文化的认知和传承遭遇重大挑战,若不加以处理,有可能使文

化传承产生断层现象。

2. 政策支持存在差异。部分国家视“送王船”为“小众民俗”,重视程度普遍偏低,没有专项保护方面的资金。以马来西亚为例,只有 3 个州将其列入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没有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送王船”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在仪式场地的维护、传统技艺和传承人的培养等方面都受到限制。

3. 商业化风险。在文旅融合开展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进行文旅开发的问题,使得仪式的神圣内涵消解。厦门某景区的“快餐式送王船体验”,将原本 3 天的仪式缩短到 30 分钟,这种过度商业化行为对“送王船”仪式的完整庄重性造成严重破坏,被社区长老抵制,也造成人们对“送王船”文化传承的忧虑。

(二) 创新传承策略

1. 数字化技术创新应用。Die Yu 等人(2023)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发现送王船仪式在现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可借助互联网、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其传承^[8]。郭凌翔(2019)在研究“互联网+”环境下非遗文化传承多样形式时,提出了一个少见的观点,即采用互联网技术、新媒体办法对“闽台送王船”民俗活动加以推广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出与王船工艺品、纪录片、玩具等相关的衍生产品^[9]。借助新媒体手段,让非遗文化题材不停创新,凭借互联网与旅游市场的力量传承文化,这一创新策略使更多人可以轻松地接触、认识“送王船”文化^[10],还使年轻一代拥有全新的学习方法,激发了他们对“送王船”文化的浓厚兴趣。

2. 教育融入。菲律宾华文学校将“送王船”编入学校课程,深挖其文化育人价值,开设“王船木工课”“仪式舞蹈课”等具有特色的课程,使学生于实践中学习、传承“送王船”文化^[11];与厦门大学共同推出“闽南文化海外传承”线上研修培训班,培养跨文化的师资,为“送王船”文

化的传承给予人才保障^[12]。

3. 社区联合治理。搭建“政府+侨团+学术机构”的三方合作机制，共同促进“送王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与南洋理工大学共同成立“送王船研究中心”，按时举行国际研讨会，邀约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共同探讨“送王船”传承与发展的状况^[13]，并编制《非遗传承操作指南》，为“送王船”文化的传承给予科学规范的指示。

五、结论

（一）从地域民俗到文明对话的使者

“送王船”在海外传播发展，历经岁月不断演进，是闽南文化同世界交往的形象缩影，它很好地证明了文化传播的“双向赋权”规律：华人以坚守“送王船”仪式传统的方式，保持了自身独有的文化身份；以开放包容的性格吸收当地本土元素，产出有生命力的文化样式。在全球化的当下，“送王船”所展现出的“和而不同”智慧十分宝贵，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促使不同文化开展交流与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材料。

（二）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欧美华人社区中。与东南亚地区有所不同，欧美地区是温带海洋环境，文化背景同样有较大的差异，开展“送王船”在欧美地区适应性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展现“送王船”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景象，为闽南文化全球传播提供更丰富的案例及理论方面的依据，进而带动闽南文化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姜守诚. 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J]. 世界宗教研究, 2011(4): 75-87.

[2] 张昊. 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民间习俗传播——以闽南“送王船”为例[J]. 大众文

艺, 2022(7): 31-33.

[3] 石奕龙. 富美宫传统的送王船与厦门等地的送王船仪式异同研究[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8(4): 163-171.

[4] 施晓楠. 中马非遗“送王船”交流现状与传承研究[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3, 21(4): 138-144.

[5] 孙静, 陈晓风. 船以载史: 象征人类学视角下的送王船仪式及其海洋观念[J]. 东南学术, 2025(3): 238-245.

[6] 田禾. “送王船”的文化价值探究——基于“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视角[J]. 福建艺术, 2022(11): 32-36.

[7] 林继富, 马培红. 从送王船看非遗多地域传承的逻辑理路[J]. 文化遗产, 2022(4): 27-34.

[8] YU D, LIN S Y, WANG Y T, et al. Multicultural heritage of “Min-Taiwan King-sending Boat”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2023, 1(2): 99-104.

[9] 郭凌翔. “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文化的多元化传承——以“闽台送王船”民俗活动为例[J]. 福建史志, 2019(2): 28-31+63-64.

[10] 郭凌翔. “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文化的多元化传承——以“闽台送王船”民俗活动为例[J]. 福建史志, 2019(2): 28-31+63-64.

[11] 张燕群. 基于海洋文化的综合实践活动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施——以福建闽南“送王船”民俗活动为例[J]. 教育科学论坛, 2026(2): 33-35.

[12] 方钰森. 两岸融合发展视角下送王船非遗现象及对外宣介路径研究[J]. 中原文学, 2025(6): 49-51.

[13] 陈阳, 刁统菊. 仪式传统与日常生活——以厦门吕厝“送王船”仪式为例[J]. 民间文化论坛, 2025(1): 27-37.